

## 一副对联毁了这位民国县长的清名

我念大学时，看过一部叫《徐九经升官记》的电影，里头有段“当官难”的唱词，几乎可以背出来：

我这被管的官儿，  
怎能管那管官的官？  
官管官，官被管，  
管官、官管，  
官官管管，管管官官，  
叫我怎做官？  
我成了夹在石头缝里一瘪官！

……

徐九经是玉田县的县令，俗称“七品芝麻官”。

其实这粒“芝麻”并不小，压在谁的脑袋上都胜过一座大山。国人怕官，称之为“芝麻官”，不过是阿Q心态作怪。

过去有句话，“郡县治，天下安”，一县之大，方圆从数百到数千平方公里，人口少者数万，大者十几万、数十万甚至逾百万，要做到“保境安民”，真的不是一件易事。

当时各地主政一方的地方官到底是干什么的？他们的生活写照是不是如戏里所演的那样：每天送往迎来，征粮收税，在公堂上审几个奸夫淫妇、宵小之徒，公务之余就与当地的秀才吟风弄月，诗酒唱和？

合浦是广西大县，因汉朝设郡而闻名。我常向外人“吹嘘”，此地乃中国最古老的郡治之地。手头正好有几册合浦旧志，且看一下民国时期的县太爷终日经营些什么活计。

书里有1947年的统计月报，合浦为当时广东管辖的“一等县”：“**粤中各县，地域之广，以合浦为最。**”人口五十九万零三百四十一人，面积七千三百五十九平方公里，现在的浦北县当时也属合浦县管辖。

民国时县长的产生，由省里的民政厅厅长提议，经省政府议决后任命。

在县政府包括各种训令、通令、布告、往复文书的史料中，一位名叫“宁可风”的县长出现得特别频繁。

查了一下，这位宁可风是与合浦县相邻的灵山县人，生于1898年，毕业于中山大学的前身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，当过记者，二十八岁就当上了灵山县县长。1929年夏至1930年夏任合浦县县长。

有人喜欢给民国贴金，实际上那真不算什么政通人和、国泰民安的好时代。

从1912年起，到1949年止，“三十八年过去，弹指一挥间”，合浦的县长犹如走马灯一般，一共换了三十七位，最长的任期不过二年许，最短的仅两月，真的是“铁打的衙门，流水的官”。

干了才一年的宁可风，接近于县太爷们任期的平均数。他到底干了些什么呢？

2017年，合浦县一座民宅在施工时发现了一块石碑，上书《合浦中山公园碑记》，碑文就是时

任合浦县县长的宁可风所撰。

碑文称：合浦中山公园，是原来的县长钟喜赓（曾任爱国名将陈铭枢秘书）提出，与乡绅接洽捐地事宜后选定了地址；李立民县长接任后与驻军戴师长一起，筹集四千元开工建设。宁可风任职后想到万事开头难，也不甘落后，与合浦人民上下一心，真抓实干，奋战三个月终于将其建成，还在公园东边建了一个图书馆。

（念作始之实难，岂继述之敢后？……与邑人通力合作，历三阅月而园之规模楠具，更就园之东隅旧城隍庙址辟图书馆一幢。）

这篇碑文很有意思，将公园建设的来龙去脉说得一清二楚，丝毫没有贪天之功为已有，体现了“历届班子、历任领导”起的带头作用。

这大概是与宁可风受过去官场弘扬的“循吏文化”熏陶有关，从中也可看出其官品人品不算太差。

宁可风受过新式教育，治理上颇有现代理念，特别热衷于市政、卫生、教育等公共事业。

他先前在灵山当县长时，也建了一个配有图书馆的中山公园。当时灵山比较落后，居民不知卫生为何物，死老鼠、死鸡、死鸭，甚至死掉的胎儿，都乱丢在暗沟里，弄得县城脏臭不堪，经常发生瘟疫。群众又迷信鬼神，求神拜佛，请僧人道士驱邪以保佑平安。

宁可风下令捣毁神像、拆除庙宇，利用其材料建造中山公园，同时修路植树，县城环境焕然一新。

宁县长还号召各乡村将庙租收充教育基金，灵山的学校一下子由原来的三十多间发展到二百余间。

宁可风任合浦县县长时签署的公文中，绝大多数都是社会事务，也就是现在常说的民生福祉。主要有三类：

第一类是市政建设。

在其任内的县政报告书中，记载有当时属合浦县管辖的北海的相关市政建设情况——“北海地处合浦之南，北濒大海，为钦廉各属出口要隘。辟埠以来，人口日繁，商业亦从而繁盛。顾历来衢道狭隘，交通卫生略无顾及”。

正是开埠后的现实需要，自1925年起，合浦在北海大兴土木，开工建设时称“大马路”“二大马路”的中山路、珠海路，在宁可风接手后，“赶速开筑”，完成了扫尾工作。

宁可风还着手修筑了猫行横马路和通中山路的佑安社路，以及佑安社路经法国领事馆到廉北车站的道路，重新修筑了洼陷损坏的东二巷等路段。

一方面在市政建设上想法很多，另一方面任职时间太短，宁县长的遗憾显然大于成就感。

在他的工作报告中，已有规划但尚未建设的，有升平街一段、大西街一段，珠海东第一市场连接中山东路邮局一段和德芳巷、金源巷。此外，宁可风也在积极筹措北海中山公园和合浦东坡公园的建设，但因种种原因，“交卸在即，不及乐观厥成”。

第二类是卫生教育事务。

麻风病是当时令人闻之色变的传染病，英国教会在北海创办了“西南诸省绝无仅有”的麻风医院。因医院“毗连街市咫尺之地，内住疯人百余，其便溺脓血，毒水溢流水井，大碍卫生”，

院长沈永年给县府打报告，打算迁往距北海三四十里的三合口竹瓦洞。

宁可风签发公函，称麻风医院“开办已历三十余载，有功于地方殊非鲜浅”，就批准通过外国教会购地或租地等事宜，请示广东省民政厅，为其积极争取。

还有一份文书，是关于取缔教员用土话教学的训令。宁可风县长的训令极有意思，兹录如下：  
查本县各小学，无论县立区立，几乎可以讲是完全袭用土语教授，这种不良习惯，不但使学生看读语体文字发生窒碍，更将养成狭隘的乡土观念，影响尤大自此次通令之后，务望各校校长督率教员马上废弃土语教学，一律改用和标准国语相近的语言来做教授语言，切实改革奉行。

要知改革之初总有些小勉强困难，那是万不能免掉的，倘以稍觉勉强困难便因循下去，那真永无改进的希望了

此令。

这种口吻，是否像父母谆谆教子？难怪县官过去叫作“父母官”，爱民如子的情状溢于言表。

第三类是各种禁革事宜。

这些文书包括“查禁招摇诱骗”“严禁各团警刑讯人犯”“禁革迷信陋习”“查禁良娼杂处”“严禁卖妻陋习”“严禁县属杂赌”“查禁停棺不葬恶习”“禁止盗窃寺庙砖石”“查禁妇女束胸”“取缔捐税机关私擅逮捕”“严禁疯人出入街市”“严禁乡人毁损公路电线”“取消齐醮捐彻底禁革迷信”“申禁盗拆城砖”“重申溺婴禁令”……

这些以布告形式张贴在公共场所的政令，在现在看来，都是一些社会管理的鸡毛蒜皮小事，当时却是一县之长的日常事务。

有道是“细节是历史的注脚”，这些公文史料，为观察辛亥革命后开启百年未有之变局在社会层面的种种变化，提供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。像禁止妇女束胸和刑讯人犯对于当时社会的冲击，令人浮想联翩。

主政一方的县长，如此重视市政建设、卫生教育事业，着力革除迷信、赌博、娼妓、卖妻、溺婴等恶习，厉行禁止刑讯逼供、捐税机关私擅逮捕，这种施政重心的转移，表明在欧风东渐的背景下，社会治理的内容和方式发生着微妙而深刻的变化。

让人感慨的是，身处时代鼎革之际，宁可风决意做这些“移风易俗”的琐事，等于要改变一个地方沉淀千百年的文化。如马克思所说：“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，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。”他遇到的麻烦和阻力可想而知。

我猜想，一方面，这是因为他的“书生意气”，年轻气盛，受过新式教育，还当过记者，有一种改天换地的坚毅果决；另一方面，也是时势造英雄，时代风气激荡。

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，由少壮派的新派人士担任各县主官，在两广一时蔚成风气。除了宁可风，他的继任者——合浦人廖国器，还有差不多同时期担任钦县县长的许锡清，也都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。

“政声人去后，衙门话短长”。当官谓之“上台”，不管自己如何看待，在老百姓眼里，上台的每个人自然都是演员，作为看戏的免不了要叽叽喳喳，评论一番。

1930年六月六日，广东省政府议决将宁可风调回省里。宁可风去职时有人撰写了一副对联：

宁可风吹归大海，  
不教秽染污廉山。

后人说这副对联讽刺宁可风不守清行，是把他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铜钉。

我觉得似乎也可解释为赞扬他的耿介之气：两袖清风朝天去，不愿意留在恶浊的地方官场，避免受到玷污。

（附：据《灵山人物志》记载，离任后的宁可风，在“七七事变”后为抗日奔走，曾被蔡廷锴任命为抗日游击队的副司令，还曾营救过被国民党逮捕的中共地下党员，被告发“容共通共”、广西解放前夕，他利用社会影响劝说灵山县国民党军政人员投诚。1949年灵山县解放之初，曾获聘为县人民政府顾问。）